沃尔兹的权力政治理论初探

刘 静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肯尼思·沃尔兹在对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进行修正的同时,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出发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归结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首先提出了界定政治结构的三个标准: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由于系统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体系的分布结构同体系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沃尔兹权力理论具有物质性和适度性两大特征。

[关键词] 国际政治; 权力; 沃尔兹; 适度性; 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0)01-0014-07

肯尼思·沃尔兹作为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开创者,借鉴了结构功能主义、科学哲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试图创立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简洁而优美的国际政治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要具备高度简约和优美的标准,同时又要实现其解释和预测国际现象的能力。沃尔兹的结构体系理论为国际关系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沃尔兹对备受现实主义关注的权力理论也做出了新的诠释,他提出了总体权力解析模式,认为国家的权力实际是指某个国家拥有的全部能力的总和,这种全部能力的总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体现也就是某个国家在国际权势分布结构中的相对地位。换言之,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系统中,因此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更为重要的是,沃尔兹并不追求权力的最大化,他认为追求权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寻求安全,国家追求权势的目的也在于维持现状。本文首先将对沃尔兹理论中的权力概念进行解析。

一、沃尔兹的权力概念

对于权力概念的界定,沃尔兹认为尽管在作为权力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权力”是一个关键性概念,但是对权力的充分定义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因此,沃尔兹只是从“谁更能影响谁的”角度出发定义权力,[1](P.304)而并没有对权力进行适当的定义。他对摩根索将权力与影响力视为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持有异议。他认为应该从影响力来理解和界定权力,并从行为结果判断是否存在一个行为体对另一行为体的权力。[2](P.257-258)实际上,只要某一行为体施加的影响大于它所受到的影响,该行为体就具有对其他行为体的权力,而无论其是否具有主观意识。

就权力概念的认识,沃尔兹还区分了两种对权力问题产生混乱认识的根源。首先,是由于将武力的有用性错误地等同于武力的使用。沃尔兹认为,权力的拥有不应该与武力的使用相混淆,武力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用性”也不应与其“可用性”混为一谈。[2](P248-253)强国依靠武力来维持有利于其生存发展的权势现状，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国在国际社会的每次博弈中都要运用武力来实现其目标；同时，尽管现在大国之间已不再彼此对抗，但是大国依然能找到使用武力的方式。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们已目睹政治组织的崛起与权力的蔓延，但核僵持并未使武力的使用就此消失。在冷战中，权力始终高度集中，武力的使用虽时有发生，但并不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疯狂，而是受到了约束，其使用是为了实现明确的尽管并不总是正确的政治目标而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军事力量都不足以实现和平，尤其当一个国家内部派系林立，人民又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时就更是如此。沃尔兹明确表示，虽然武力不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根本区别，但是自助性的国际体系却使得国家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权利。“武力不仅是终极手段，而且是首选的和常用的手段”[2](P150)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在无政府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而国家是否使用武力完全取决于对使用武力的成本与收益的理性估算。

导致对权力问题产生混乱认识的第二个根源在于对权力的奇怪的定义。美国学者关于权力实用主义的、受技术影响的定义——该定义将权力等同于控制，造成了对于权力的认识误入歧途。将权力定义为“原因”混淆了过程与结果，而将权力等同于控制就等于是断言，只需拥有权力便可为所欲为。这显然是错误的，权力只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不能被鼓励地看待。普通意义上从联系的角度定义的权力概念没有考虑行为结构是如何影响单元行为和单元间的联系。以服从与否作为衡量权力的标准将使非故意造成的结果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从而丧失了许多政治内容。权力的大小不能根据可能或不可能取得的结果来加以推断，权力的实现和对于权力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必定会取得预料到的结果，要适用于政治领域，权力就必须根据能力的分配来加以界定。

（一）沃尔兹权力理论的结构基础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沃尔兹所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摒弃了摩根索以人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的权力立论角度，认为人性是既无法测量也无法证伪的先验判定，“结构不仅取决于（而往往并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国家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结构的变化。”[2](P18)而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国际现象和国际关系，这一独特的视角是沃尔兹理论体系不同于以往理论的鲜明特点，更为重要的是，沃尔兹对于权力理论的阐述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分析架构之上的。沃尔兹在承认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体的同时，否定了摩根索理论中国家异质性的说法，借用了经济学中市场理论分析方法，抽象掉了各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信条、政治领袖、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差别，提炼出国家的共性，即它们的功能相同，追求同样的目标，只是实现目标的能力参差不齐。[2](P129)

同时，他把大国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提出大国是国际体系中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决定体系的结构，国际政治理论以大国为基础。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界定的。国际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2](P193)因而体系的“分布结构”（即体系中大国的数量）同体系的稳定性（即未发生全体系范围的总体战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此外，沃尔兹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归结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在他看来，也正是这个深深地植根于国际体系的结构难题阻碍了国家间的合作：“不安全的环境条件——至少各国对于别国未来意图和行动的不确定性——妨碍了它们的合作。”[2](P105)沃尔兹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生活的两个彼此相连的现实。第一是自助。在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对国家的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随处可见。无时无刻不注视着这种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第二是猜疑和敌对。由于相互关系总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国际政治行为体总是相互猜疑和敌对。因此就个别国家而言，只能是全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2](P.3)“安全困境”思想实际上铺垫了一个检视的理论基础，使当时极为流行的从权力争夺视角解释国际政治的动力机制逐渐地转移到从安全竞争的视角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动力机制。[3](P4)

因此，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的慰籍之源乃另一方的忧虑之源。因而，在一个国家积聚战争工具，即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一种威胁。这种反应本身又反过来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担忧的。类似的，一个出于防御目的而建立的联盟加强内部成员间的凝聚力，提升自己的地位，必然会无意中危及对立同盟，招致对方的反制措施。”[4](P620)由此可见，“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无力”[2](P.247)沃尔兹认为，追求权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寻求安全，因此在权力表现的最充分、最安全的地方，武力的使用就越少见。[2](P.250)权力用来维持秩序，武力的使用则标志着崩溃的可能。强国往往能够采用其他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或实现自身的意愿——例如说服、劝诱、经济上的讨价还价以及贿赂、提供援助、直至进行武力威慑——从而使得强国必须动用武力的情况比弱国要少。[2](P.248—249)

(二)沃尔兹权力的功能

既然权力无法导致控制，那么权力的作用主要发挥在哪里呢？沃尔兹认为：权力主要有四种作用：首先，当别国使用武力时，权力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独立自主；其次，享有更大权力的国家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行动余地，同时使行为结果难以确定。第三与弱国相比，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弱国的行动余地十分狭窄。不适宜的行为、有缺陷的政策、有悖常规的举动都可能招致致命的后果。相反，强国则可以漫不经心，不对情况加以了解，它们可以一再重复相同的愚蠢举动。更为明显的是，它们可以减缓对他国明显的威胁行为做出反应的速度，直至辨明该举动是否真正对它们构成威胁。它们可以对大多数威胁默然处之，因为只有极少数威胁能使得它们遭受重大损失。它们可以保持克制，直至事态得到澄清，而无须担心错失采取有效行动的良机。第四，巨大的权力使其拥有者在系统中具有重大利益，并赋予其为实现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对它们来说，进行管理是值得的，而且也是可能的。[2](P.262)

(三)对均势的研究

均势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也是沃尔兹权力理论的重要内涵。沃尔兹说：“如果有任何具有特征性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话，那就是均势论”。[2](P.117)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均势就是指国际体系中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呈现出一种大致上的平衡，这种平衡足以能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最终实现其称霸的野心。[5](P97)

首先，对于均势形成的原因，沃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安全困境，推导出均势形成的必然性，即“均势的自动生成”，这也是对摩根索“均势自然存在”的重要修正。[2](P.43—78)均势理论的开端，源于对国家的这样一种设想：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主体，最低限度达到维护自身的现有的安全和权力优势，最高限度则是追求世界霸权。国家以理性的选择，通过使用可找到的各种手段，如提高自身实力和结盟等手段，去实现目标。但在国际政治的竞争环境下，国家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互相影响和冲突，国家的互动和追寻权势的结果是趋向于权力均势的形成。沃尔兹认为均势是国家体系必然出现的一个特征，是无论国家是否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都必然会发生的一种体系趋势。因此，均势并不是各国自觉维持的一种平衡状态，而是一种自然状态，是在国际体系天然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下对安全的追寻迫使每一个国家为摆脱安全困境而采取同样的行动，从而导致了均势的产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认为均势理论只是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预测了大国在国际政治系统中形成均势的行为倾向，均势的出现本身就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无误。[6](P38-39)均势理论是要求国家总是按照均势的原则来行事，政治行为体是选择彼此制衡还是追随强者，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在国内政治中，选择均势或者是追随强者都可以得到体现。但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不希望任何国家能够取胜，所有强国都不希望任何一国成为领袖国家”，所以国家倾向于选择均势行为，“倾向于加入两个联盟中较弱的一方”。沃尔兹认为，“如果国家追求的是权力最大化，就会加盟较强的一方，那么均势就不会形成，而只会出现世界霸权。”但国家追求的是安全，“权力的增加也许会，也许不会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所以国家会选择“涌向较弱的一方”，通过构建均势来满足自身对安全的追求。[2](P166-168)

其次，沃尔兹还极为推崇两级均势理论，并将之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之一。他认为两级结构与多级结构相比较而言，有三点优势：第一，在两级世界的大国政治中，谁将对谁构成威胁，并且最终应由谁来应付这些危险从来都是非常明确的；在多级世界的大国政治中，谁将对谁构成威胁，并且谁能够被期望去应付这些危险，全都是不确定的事情，[2](P229)总之，他认为参与数量越多的体系越不稳定。因为随着国际行为体数目的增加，每个政策制定者采取特定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而不确定因素越多，政策制定者对潜在敌人的意图和行动就越可能产生误判。因此，多级体系的不确定因素要比两级体系多，多级体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比两级体系大。更为重要的是，“两级结构”同“多级结构”相比，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国家避免国际政治中普遍会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因而它不仅有利于保障均势机制的顺利运作，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对国际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7](P163 170 198)

第二，在两级结构中，权势的分布失衡只有通过内部努力才能加以克服；而在多级结构中，联盟的变换为各国提供了另一种制衡手段，这种手段必然会增加体系的不确定性；而这点体现了两级结构相对于多级结构的另一种优越性。也就是说，两级结构中的制衡手段只有一种，即大国各自的内部努力，多级结构中存在这两种制衡手段，除内部努力外，还有一种是构建同盟，即各国间同盟和阵营的交替变换，正因为多级结构中存在两种制衡手段，而两级结构中只有一种制衡手段，因而两级结构的稳定性实际上远胜于多级结构。[2](P226)

沃尔兹认为，多级结构的弊端是存在几个实力上均等的大国，没有任何一方的力量强大到足以独自承担国际角逐的能力，因而各国都不能承受丧失盟友的损失，这种基于实力的较量使得盟友变得异常重要。而在两级结构中，竞争变得更为广泛而全面。不仅仅是军事准备，而且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都成为引起激烈而持久关注的事务。双方都靠自力更生，对危险也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对于谁将面对这些问题也很明确，这是两级世界中大国政治的特点。[2](P229-231)

第三，沃尔兹强调两级结构相对多级结构而言，它的另一大优势是有利于大国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减少，这就意味着大国间发生冲突的机会的减少。基于国家间实力的不平等对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重要影响，即国际政治中各国间虽然形式上是平等的，但由于国家间实力的巨大差异，因而各国的互动一方面反映出某些国家的不同程度的独立性，但它也反映出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依赖性。[8](P96-100)

不同的是，沃尔兹所界定的相互依赖就是指各国间相互依附程度，而不是各国间政策敏感程度。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就是指行为体彼此间的依附性，即相关的行为体几乎同等地依赖与彼此间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而后者则是行为体彼此的敏感性，即它们中任何一个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行为体。对于沃尔兹而言，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多级结构中要远胜于在两级结构中，即“一个由不平等的单元组成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一个只有少数国家能很好照顾自己而多数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世界几乎同样也不可能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9](P216-220)

总之，就均势形成的原因而言，沃尔兹认为权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均势是由国际社会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所产生的必然趋势，是国家基于理性选择的自主行为；就均势的结构而言，他强调两级结构同多级结构相比，其稳定性要远胜于多级结构的稳定性。事实上，无论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权力，平衡权力还是平衡威胁，均势理论要求国家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那就是“平衡”政策。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国际体系的现状，确保国家不受威胁，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安全感。在沃尔兹对权力做出新的解释同时，其权力政治理论的特点表现如下。

二、沃尔兹权力政治理论的特点

（一）权力的物质性

沃尔兹的权力理论继承了现实主义大师们对于权力物质性的观点，并有所发展。他将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焦点集中到两个关键要素，即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它假定国际系统结构的排列原则是分权的、无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持久不变的特性[2](P 8)。正是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造就了互动单元的相似性。在此，他认为互动的单元是指国家。虽然各个国家在领土、财富、权力和形式上千差万别，然而国家完成的或试图完成多数任务具备共同的性质。它们追求的目标很相似。[2](P 20)换言之，国家之间的区别在于能力而非功能。尽管功能各异，但是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任务。

与国内政治系统不同，国际政治系统中，能力（包括权力）的大小是区分单元的标准，系统的结构会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沃尔兹认为国家的权力实际是指某个国家拥有的全部能力的总和，而这种能力的总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某个国家在国际权势分部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也就是说，“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系统中，因此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取决于国家在下列各方面的得分，即人口数量、领土大小、资源储备、经济力量、军事实力、政治上的稳定及能力”。[2](P 174)同时，沃尔兹极力强调权力的物质性，他认为尽管有人抱怨现实主义者没能够设计出可以衡量权力的客观标准，可是不管对权力的衡量存有多少困难，这些只不过是当理论转向实践运用时遇到的，而不是理论自身的困难。[10](P 76－77)

（二）权力的适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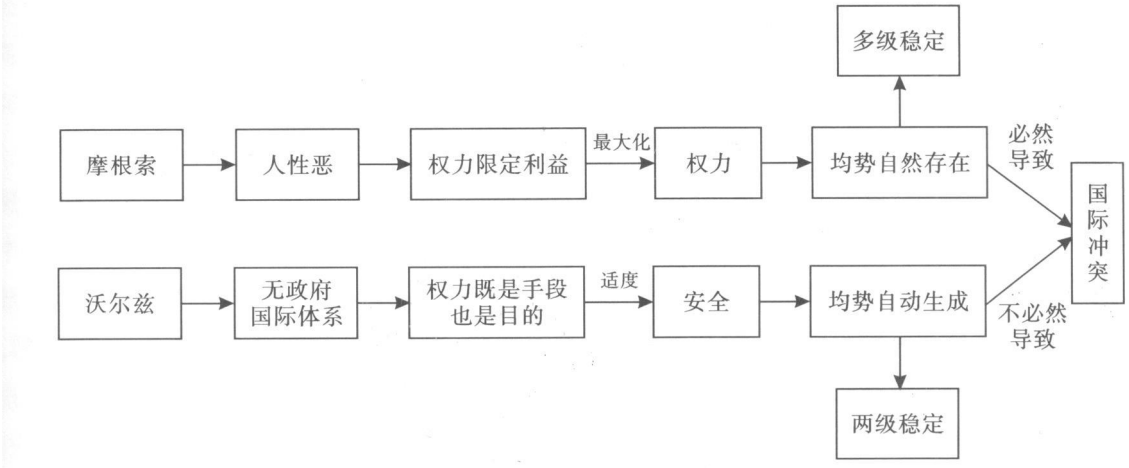
沃尔兹对于权力的阐释区别于其他理论流派最为突出的特点即他更加强调权力的适度性。他认为，在国际政治博弈进程中，“国家的首要关切不是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护它们在体系中的地位。”[2](P 167)维护地位的必然逻辑推论便是国家对安全的追求，“体系促使国家去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增加的权力也许会，也许不会服务于该目标。”[2](P 167)在沃尔兹看来，尽管国家有利用他国的软弱和虚弱获取权力的动力，而且当时机成熟时这样的行动也的确有良好的战略意义，但倘若大国行动起来咄咄逼人，则潜在的受难者通常会采取行动来联合制衡进攻者，并会千方百计地挫败其获取额外权力的努力。[2](P 143)这样一来，进攻行为给进攻国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权力和安全的受损，而不是权力和安全的收益。沃尔兹的这种“地位维持说”被指责为“新现实主义的现状取向”。[11](P 90－121)

与摩根索权力理论中，将追寻权力视为国际政治的首要目标相反，沃尔兹认为权力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国家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安全，即使在均势状态下也不例外，因此权力太大或者太小都有风险，某一国家拥有太多的权力将使其他国家感到惊恐不安，促使他们团结起来与其对抗，从而使它变得更不安全。而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太少的权力，则会诱使其他国家对其实力的虚弱加以利用。没有任何形容词修饰的现实主义是最好的。[2](P 20)换言之，根据沃尔兹的权力—安全逻辑，作为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手段，国家权力积聚的安全效用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点的权力积聚便无助于国家安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损害国家安全。因此，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获取并握有适当的国家权力。这使得沃尔兹的权力理论倾向于防御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趋势，也因此被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

沃尔兹的权力理论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国际冲突的国际社会本质出发，在结构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权力概念的权力的结构基础、权力的功能和对均势的研究上（形成原因和均势的结构）修正了摩根索的权力理论，对权力作了新的诠释，物质性和适度性是其权力理论的主要特点，两者的不同如下图所示。



图表 1　摩根索和沃尔兹权力比较逻辑图

沃尔兹权力理论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结构性、以及权力的适度性和物质性。首先，结构性理论是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最大的贡献，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权力这一独特视角更是为沃尔兹权力理论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理论的特点；其次，沃尔兹对于权力的阐释区别于其他理论流派最为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更加强调权力的适度性。他认为，在国际政治博弈进程中，“国家的首要关切不是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护它们在体系中的地位。”[2](P126)维护地位的必然逻辑推论便是国家对安全的追求，“体系促使国家去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增加的权力可能也可能不服务于该目标。”[2](P126)沃尔兹极力强调权力的物质性，他认为尽管有人抱怨现实主义者没能够设计出可以衡量权力的客观标准，可是不管对权力的衡量存有多少困难，这些只不过是当理论转向实践运用时遇到的，而不是理论自身的困难。[10](P78)这就使得他的权力理论与现实主义其他理论流派较为明显的区分开来。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Barry Buzan ed.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M]. 1991, New York: Harvard Wheatsheaf.

[4] 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8(18).

[5]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0(25).

[7]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Idea of World Community[A]. Ken Booth &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9] Kenneth Waltz.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Kindleberger, 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70.

（下转第 30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 毛泽东. 不能停止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批评[A]. 毛泽东外交文选[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3]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A]. 毛泽东选集(第4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4] 王泰平. 新中国外交50年[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5] 徐焰.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J]. 炎黄春秋, 2008(2).

[6] 谢益显. 折冲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40年[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7] 尼克松. 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8] 李长久, 施鲁佳. 中美关系二百年[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9] 宫力.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J]. 美国研究, 2001(2).

[10] 石 丁. 往事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瞬间[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11] 童桐. 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写在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30周年之际[J]. 世界知识, 2009(2).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13]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电视台. 邓小平[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14] 刘自强.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启动[J]. 理论月刊, 2008(5).

[15] 石志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6] 张秀阁, 刘凤芹. 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J]. 党史纵横, 2008(8).

[17]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M]. Simon & Schuster, 1994.

[18] 王根礼, 周天珍. 外国首脑论中国[C].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8.

[19] 李庆余. 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20] Robert Divine. The Illusion of Neutrality[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

[21] 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双木)

(上接第19页)

[10]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A]. Kegley ew.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C].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Randall Schweller. Neo 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A]. Benjamin Frankel.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C]. London/Portland: Frank Cass, 1996.

(责任编辑 双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